

“货畅其流”

辞源浅疏

程延明

货畅其流与人尽其才、地尽其利、物尽其用并论，作为治国之道的纲领性主张，是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由郑观应和孙中山先生相继提出来的。

郑观应（1842～1921）是清末改良主义者中的有名人物之一。1894年春，他在《盛世危言》一书的自序中，倡议“兴学校，广书院，重技艺，别考课，使人尽其才。讲农学，利水道，化瘠土为良田，使地尽其利。造铁路，薄税敛，保商务，使物畅其流”，认为这是当时清王朝的“治国之本，治乱之源”。这里“物畅其流”和他在《盛世危言》中主张的“振兴商务”是密切联系的。

要振兴商务，使物畅其流，第一要重视商务。认为“商以贸迁有无，平物价，济急需，有益于民，有益于国。”“商贾具生财之大道，而握四民之纲领”。因此他主张清政府应当“体商情”、“保商务”。第二要革除积弊。认为阻遏商务振兴和物畅其流的根本原因是官对商的盘剥、遏抑，其重要形式是设关卡、征厘金，因而要求“剔厘弊端”“使胥吏无阻挠之弊，官宦无侵夺之权”，并建议“减内地出口货税，以畅其源；加外来入口货税，以遏其流”。第三要“以工翼商”。认为“商务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，尤必视工艺之巧拙”。所以振兴商务必须通晓科学技术，精于制造，即所谓“通格致，精制造”。因为“制造不精”、“价值不廉”就会使“货流无源”。第四要发展铁路、轮船、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。认为“天下商埠之盛衰，视水陆舟车为转移”。如能做到

“铁路近、轮船便”、邮电四通八达，就可使“商贾便于贩运”，就可使“运费省而销路速”，就可使“信息便捷”，从而做到“转运灵通，销场畅旺”。他认为，这些兴革之举的结果可以使“货物翻新销流畅旺”，可以商富而国富，并可杜绝利权外溢，即所谓“上以仰承国家之要需，下以杜绝外洋之厄漏”。

在《盛世危言》出版的同年，即1894年夏，孙中山先生赴京上书李鸿章，提出“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力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。”四项革新政治的主张，并指出“此四事者，富国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”，“所谓货能畅其流者，在关卡之无阻碍，保商之有善法，多轮船铁道之载运”。

“关卡之无阻碍，保商之有善法”，是指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，商人“过省有关，越境有卡，海口完纳，又有补抽，处处敛征，节节阻滞”，虽然“经商异地，情至苦”，但得不到体恤反遭“剥损遏抑”，以致“商贾不愿出市，百货也难以畅流”。如“无关卡之阻碍，则商贾愿出其市；有保商善法，则殷富亦乐于贸迁”。“多轮船铁路之载运”是指当时运输条件不发达，不能“通繁富之区，收一时之利”，货物转接不灵活便利，无法“一方困境，四境接济”。因而主张发展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事业，“多轮船铁路之载运，则货物之盘费轻，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？”

孙中山先生认为货畅其流的意义在于“货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”、“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”，如果“货物不流，则财源不聚，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，以其天生之材为废材，人成之物为废物，则便何贵于多也”。货畅其流可以利民利国，“贩运亦百姓生财一大道，百姓足，君孰不足？”因此他主张清政府应摒弃“徒以聚敛为工，捐纳为计”。认为“筹富国者，当以商务收其效”。